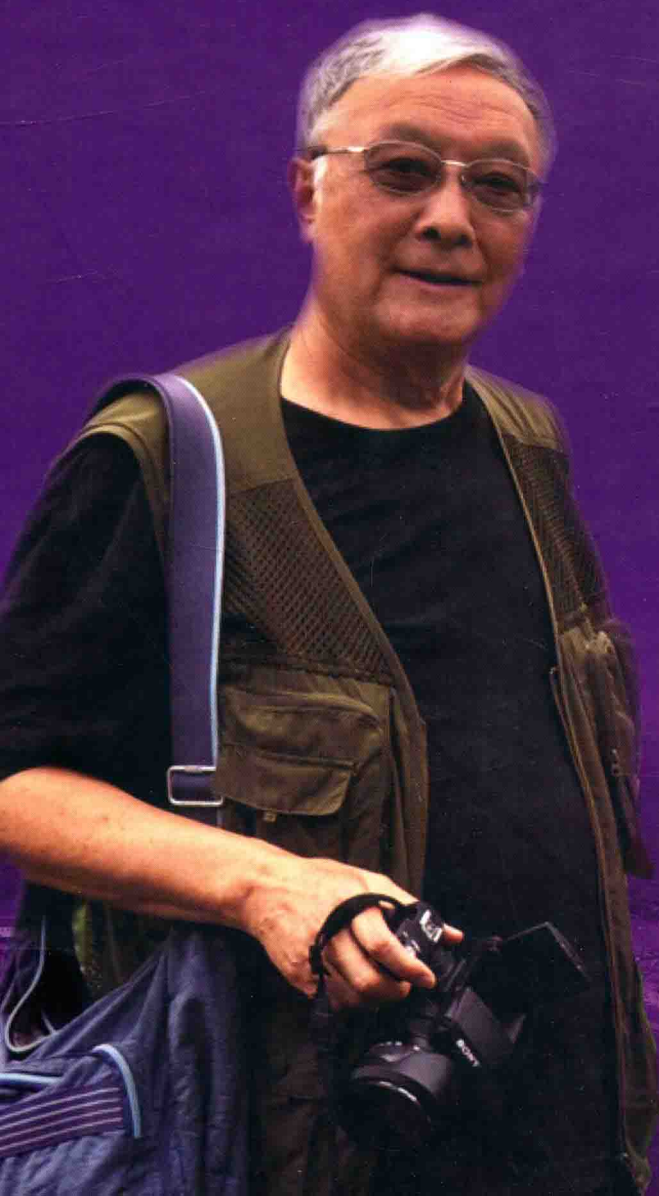


张复合 著

三十年 雁迹泥痕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文选

(1985—20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三十年雁迹泥痕

(1985—2014)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文选

张复合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三十多年间所著百余篇论文中的 58 篇。作者通过各种方式从多个侧面展现了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历程之全景,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是有志于从事此项事业的青年学子和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书。

本书有大量附图,其中多幅历史图照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对建筑原貌的了解;大量由作者本人实地拍摄的照片,则有助于读者认识建筑的现状、了解建筑的价值,从而加深对历史建筑进行研究与保护之意义的认识。

本书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人员吸取近代建筑历史经验及从事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指导作用,对文物保护部门和开发单位保护与再利用近代建筑、开发历史地段具参考价值。本书既可作为建筑历史研究资料、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历史理论教学教材,又可作为了解当地风土历史、城市变迁的指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年雁迹泥痕: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文选:1985—2014/张复合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38829-6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建筑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②建筑物—保护—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TU-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5690 号

责任编辑:张占奎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10mm×285mm 印 张:31.25 插 页:4 字 数:951 千字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8.00 元

产品编号:061622-01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宋·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

代 序

1947年1月，哈尔滨市出生。在这个随着俄国人修建东清铁路于1898年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中长大，一到春天庭院里就弥漫着丁香花香的俄式住宅、样式奇异的东正教堂，从小就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5年报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就选取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学专业。清华园中这所最初以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名义于1911年开办的游美肄业馆，法国“孟莎”顶的清华学堂、圆穹顶的大礼堂，使他在认识梁思成的同时，又知道了美国人墨菲(Henry Killiam Murphy)。

1970年3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建筑设计教学。1978年参加北京琉璃厂文化商业街改造规划方案设计，使他接触到历史地段的调查与研究。

1983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他被派陪同以“中国近代建筑史”为题作博士学位论文的日本高级进修生村松伸赴济南、青岛考察，从而接触到了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一直被冷落的领域——中国近代建筑史。

在济南和青岛看到的建筑使他震惊。济南的商埠地、青岛的德租界，加之哈尔滨的生活，清华园的体验，使他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清华大学有关于外国古代建筑史、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则无人问津。偶然的机会、现实的工作环境、多年的潜移默化，促使他产生了投身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去的想法。

他有志于拓展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新领域的想法，得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赵炳时的支持和汪坦先生的鼓励。在建设部科技局局长林志群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首次作为科研项目在“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基金”立项(1985—1990年)。

从此，在汪坦先生的提携指教下，张复合开始步入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研究之门。他协助汪坦先生作为主要承担者或主持人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项目(1988—1993年)、“中国与东亚近代建筑研究”项目(1992—1994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与理论”项目(1996—1999年)、清华大学基础研究专项基金“中国近代建筑史”项目(1994—1997年)、清华大学“985”基金“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项目(2000—2002年)等。

1985年11月，张复合应邀参加在东京召开的“日本及东亚近代建筑史国际研究讨论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自此开始进入国际交流；他有幸聆听到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前辈村松贞次郎先生的教诲，并从此得以受到导师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藤森照信先生的指导。

节选自《建筑史解码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6月

目 录

1985—1995

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	3
香港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	12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主义认识.....	19
中国基督教堂建筑初探.....	30
二十世纪初在京活动的外国建筑师及其作品.....	41
关于三峡工程淹没区内万县钟楼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	56
历史的建筑 and 发展的城市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在北京的过去和未来.....	62
建筑与历史和环境	
——复张开济先生.....	72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与国际交流	
——写在《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一书在中国发行之际.....	74

1996—2000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81
中国近代建筑总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87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译名问题	
——兼评《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	93
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之典型.....	96
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时期之概略.....	107
历史建筑改建中的原有部分保护问题	
——从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改建工程谈起.....	112
论建筑装饰之“俄罗斯风”.....	117
原财政部印刷局中卫门翻建保护.....	119
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改建工程实践之体验.....	125
中国近代铁路客运站房建筑发展概略.....	132
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近代建筑.....	139

北京琉璃厂文化商业街区改建与历史地段保护	147
北京东堂修复及院门重建	159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168
北京近代建筑史研究与北京现代城市建设	175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教学	181

2001—2005

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工作之开展及其问题之应对	189
新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	
——深切怀念汪坦先生	195
庐山牯岭正街保护修建性详细规划	199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态度	213
近代包头：城市与建筑	216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与近代建筑保护问题	228
中国广东开平碉楼初考	
——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乡土建筑研究	237
中国近代建筑的保护再利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246
开平碉楼：从迎龙楼到瑞石楼	
——中国广东开平碉楼再考	250
贵阳北天主堂建筑考察及其历史研究	263
澳门与中国近代建筑史	269
庐山牯岭近代别墅浅谈	274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写在《建筑史论文集》正式更名《建筑史》之际	281

2006—2009

汪坦	287
张复合	290
长春历史文化研究与紫线划定	293
中西文化相互作用下的中国近代居住建筑	317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基督教堂建筑的特性	
——中国基督教堂建筑再探	332
传统承续与外来影响	
——中国近代建筑的价值	339
五彩多元：中国近代建筑与文化	348
石景山钢铁厂历史发展及其近代建筑状况研究	368
清华大学西体育馆研究	379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之认识	
——写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国际合作 20 年之际	390

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再论	
——纪念圆明园罹难 148 周年	394
关于工业建筑遗产之我见	
——兼议无锡北仓门蚕丝仓库的改建	399
马尾船政局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与现状保护	405

2010—2014

注重地方性 强调整体感	
——三亚崖城东关街沿街骑楼建筑立面复原改造方案设计探讨	425
中国近代居住建筑之发展及特征	
——结合商用功能的骑楼、骑楼街	434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状况及前景	440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势在必行	448
《华中建筑》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写在纪念《华中建筑》创刊三十周年之际	454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深化	459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记事（1986—2014）	463
简历	483
后记	485

1985—1995

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

中国北京圆明园“西洋楼”建于清朝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1745—1759年），前后历时十五年。

它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大规模成群兴建的西方风格的建筑。由于它建造在京畿“三山五园”之首、欧洲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由于它以同中国古代建筑全然不同的面貌出现；由于它在世之日很短，犹如昙花一现，因此，它在国内外都格外引人注目，对它的评价文章和书籍至今不绝（图1）。



图1 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与远瀛观

（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提供；右：2008年6月5日）

如何评价“西洋楼”？它同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关系如何？本文试图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西洋楼”与中国庭园建筑对欧洲的影响

“西洋楼”落成的十八世纪中叶，正处于世界近代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即资本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胜利和确定的时期，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640—1870年）。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对英国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主要的建筑潮流是古典复兴，在城市建筑中流行，反映着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而在庄园府邸中则流行着“先浪漫主义”，反映了封建贵族在不可避免的灭亡面前所产生的缅怀往昔、寻求新的刺激，以排遣没落之日凄凉的黄昏情绪。

先浪漫主义在建筑上的表现，主要是在庄园府邸中复活中世纪的建筑，如模仿寨堡、哥特式教堂等；另一方面，则是向往“东方情调”。

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在欧洲各国亦有出现。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建筑师勒沃（Le vau）1670年在凡尔赛公园里建造的“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英国伯克郡贝特公园建造的中国式方形建筑，1702—1723年间德王在易北河上匹灵堡建造的几所中国式宫殿，1753年瑞典为庆祝王后生日建造の木构建筑，1765年普鲁士亨利王子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式阁楼等。由

* 此论文于1985年11月29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村松贞次郎先生退官纪念会主办的“日本及东亚近代建筑历史国际研究讨论会”发表，日文文本收入村松贞次郎先生退官纪念会刊《东亚近代建筑》。

于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很少,只从水手、传教士处听到一些传闻,看到一些工艺品,因此所谓“中国式”建筑也仅限于外观的局部模仿、室内点缀性的装饰。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资产阶级到东方贸易和殖民,使西方增加了对东方的了解,遥远异国中样式奇特的建筑、神秘的“东方情调”被以猎奇的心理介绍到西欧,在英国则成为“先浪漫主义”建筑风潮中的主要内容。

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庭园建筑、并附有设计图的书是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 ?—1755)于1750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New Design for Chinese Temple, Garden Seats, Pavilion and Triumphal Architecture*)一书。此书在1755年再版,改为《中国式的农家建筑》(*Rural Architecture in the Chinese Taste*);1756年增订32幅设计图再版,改为《农家手册及农家建筑指南》(*Country Gentleman's Pocket Companion and Building Assistant for Rural Decorative Architecture*),并附有估价及材料作法。作者并不了解中国建筑,图样也仅限于从当时的旅行游记中抄袭而来,没有经过认真研究。

1757年,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 Furnitures,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一书,第二年出版了《民用建筑装饰专论》(*A Treatise on the Decoration Part of Civil Architecture*)。

钱伯斯年轻时曾服务于瑞典东印度公司,1743年随船来中国广东,居两年,作了很多有关中国建筑的写生画;1748年再度来华,第二年回欧后赴意大利学习了五年建筑。1755年到英国,留英期间受聘为皇家建筑师,并曾先后著书介绍中国建筑。1757—1763年间,钱伯斯为英国肯特公爵作蔻园(Kew Gardens)扩建设计,并著《蔻园的庭园和建筑物的平面、立面及透视》(*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s at Kew*, 1762)。1772年,他的《论东方的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问世。

此间尚有奥弗(Charles Over)、爱德华与达利(Edward and Darly)、沃塞(Lassc Wase)等人有关中国庭园建筑的著述在英国出版。

但是,当时有关介绍中国庭园建筑的著述尚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没有涉及多少设计原理。建筑作品表现出建筑师尚不了解中国建筑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内涵,仅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因此往往是曲解的;同时还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进行改动,因此又经常是走样的。以当时在欧洲颇有影响的伦敦蔻园(Kew Gardens)中国宝塔为例,即可见一斑:此塔用砖建造,平面为八角形,高49.7米,分10层——中国宝塔层数均为单数,其中道理尚为享有盛誉的钱伯斯所不知。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法国(Georges L. Le Rouge *Jardins Arglo-chinois*, 1774—1789)、德国(Hirschfeld *Anmerdungen uder die Landkansea und die Garten-kunst*, 1779)等也陆续有关于中国庭园建筑的书出现,水平都相差无几。欧洲对中国建筑从学术上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是十九世纪的事^①;二十世纪以后才达到深入系统的阶段。

中国建筑及庭园艺术对欧洲产生影响,在西方出现所谓“中国式”的建筑模仿形式,当始于法国凡尔赛的“瓷宫”(1670年),随着英国“先浪漫主义”对“东方情调”的向往在欧洲风行一时;伦敦蔻园宝塔建成后,在此后的四十年间,曾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塔在欧洲各地兴建。但是,中国建筑在西方的风行,主要是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猎奇心理和封建贵族的怀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奇的东西陈旧了,作为玩物而存在的东西也失去价值。到了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式”的建筑模仿形式很快就消失在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建筑新潮流中,只是留下一些装饰风格,为“洛可可”(Rococo)所接纳。

^① 十九世纪中叶,兰普雷(J.Lamprey)著《论中国建筑》(*On Chinese Architechure*, 1866),其后埃金斯(J.Edkins)著《中国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十九世纪下半叶,福开森(James Fergusson)著《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十九世纪末,英国出版弗莱彻(Bansiter Fletcher)的《比较法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ut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1896)。

与“西洋楼”同时，“在欧洲如英、法等国也出现中国亭园风格”，并非是“盛开在西方阳光普照的大地上的东方的鲜花”^①。

“西洋楼”与中国历史上欧洲建筑的影响

中国建筑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自己。中国建筑汉魏六朝受佛教影响，唐朝受西域影响，元朝时又受欧洲影响。

欧洲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最早见于元初。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方济各教士意大利人蒙特·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vino, 1247—1328）来中国传教，任北京第一任总主教。1299年在北京“筑教堂一所”，并且“设钟楼一所，置三钟”^②。1305年“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厩舍、房屋、厅庭及会堂无所不备。会堂可坐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之”。“教堂屋宇奂新，红十字架高立房顶”。“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约八里^③。这两座教堂现均已无存。据考，第二教堂当在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一带，它可能是西洋建筑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人用行贿的办法，使明朝地方官员承认澳门作他们的居留地，在澳门筑城造房，形成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外国租借地，使西洋建筑在这里大规模传入。

澳门的西洋建筑“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罅于周垣，饰以恶；罅大如户，内闼双扉，外结琐窗，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而后入。窈窕诘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门外为院，院尽为外垣。门正启。又为土库，楼下以殖百货。”^④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由耶稣会士斯皮诺拉（Carlo Spinola）设计的澳门圣保罗教堂（Igreja Sao Paulo，俗称“大三巴”教堂）建成。“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楼，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依疏瑰丽。……上有楼，藏诸乐器；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⑤。1835年9月23日此教堂毁于大火，只余下残壁，“现今所谓三巴门者，即教堂城墙出入口的门户也”^⑥。这是中国现在尚存的最早之西洋建筑遗迹。当时，在“澳西有小三巴寺，规制差约，而轩豁过之”^⑦。此即1657年所建圣约瑟教堂和修院，俗称“三巴仔”。

明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Matthieu Ricci, 1552—1610）到中国广东传教。1601年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东侧“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后来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加了三间，……这所房子整个有墙环绕。”^⑧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籍耶稣会神父汤若望（字道末，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在宣武门利玛窦所建礼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只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左右两砖楼夹堂而立，左贮天琴，……右圣母堂”^⑨。南堂曾两度被毁，现存南堂为1904年重建，堂门两侧所立石碑系汤若望亲记。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赐地建墓，该处后来被称为栅栏，自十七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北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

① 参见参考文献[1]。

② 引自“蒙特·科维诺第一遗札”，参考文献[2]，107页。

③ 引自“蒙特·科维诺第二遗札”，参考文献[2]，114-115页。

④ 参见参考文献[3]，21-22页。

⑤ 参见参考文献[3]，“澳蕃篇”，23-24页。

⑥ 参见参考文献[4]，67页。

⑦ 参见参考文献[3]，“澳蕃篇”，24页。

⑧ 引自参考文献[5]，515页。

⑨ 引自参考文献[6]，125-126页。

区分。利玛窦墓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其继任人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指导下设计，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圆，方若台圯，圆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垣不雕篆而旋纹。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①。

利玛窦墓址中现存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字敦白，比利时耶稣会士，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年）三人之墓，利玛窦墓居中，汤若望、南怀仁分列左右，三砖冢、三螭首石碑并立，四周有砖砌矮墙，并非原来形制。

自利玛窦进京后，欧洲教士接踵来到中国，最初的教堂多沿用中国旧式房屋，如上海最早的老天主堂——敬一堂，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设——就是利用世春堂旧址^②。后来，一些西洋教士开始自己设计，教堂作为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建筑类型才在中国普遍出现，其间有一个过程。

物质的建筑同时也是精神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时有发生，此起彼伏，教堂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同它在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教堂建筑虽然在中国出现较早，但它们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

“西洋楼”的情况则不同。它以较大规模在中国突然出现，作为“欧式宫殿”建造在中国皇家园苑之中。因此，它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的影响远非教堂可比。

“西洋楼”与意大利巴洛克及法国“洛可可”建筑风格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1736—1795 年），正当清朝盛世。他曾六次南巡，对江南园林十分欣赏。他在北京、热河各御园中都仿造了江南名园。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开始在北京兴建的圆明三园，乾隆年间达到了全盛期。

乾隆十年（1745 年）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开始建造“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总平面有如一把丁字尺。尺子头在西边，南北长约 350 米，东西宽约 90 米，自南往北主要建筑物有：线法桥、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万花阵。尺子身在东边，东西长约 750 米，南北宽约 70 米，自西往东主要建筑物有：养雀笼、方外观、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西门、线法山、线法山东门、方河、线法画^③（图 2、图 3）。

所有建筑物均为墙体承重，大多采用汉白玉石柱，墙身或嵌五色琉璃花砖，或抹粉红色石灰。屋顶为中国宫殿式琉璃瓦屋顶，但不起翘。平面布置、立面柱式、门窗及栏杆扶手等都是西洋做法。细部装饰为西洋雕刻中夹杂着中国民族花饰。

“西洋楼”建造之前并没有施工图纸，只是由耶稣会教士郎世宁（字若瑟，意大利人，Joseph Castiglione, 1688—1766）、蒋友仁（字德翊，法国人，Michel Benoist, 1715—1774）、王致诚（法国人，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等绘制图样，并有圆明园如意馆的中国画师沈源、孙祜等人参与。“西洋楼”的建成，反映了中国建筑工匠的卓越能，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使异国建筑的图样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图 3）。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郎世宁逝世 20 周年，由耶稣会法国教士晁俊秀（P. Michael Bourgeois）主持，曾从师于郎世宁的二、三个徒弟绘制成长春园铜版图二十幅^④，为后人研究“西洋楼”留下了重要的资料（图 4）。

① 引自参考文献 [7]，173 页。

② 参见《上海市大观》，屠诗聘主编，中国图书编译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中篇”117 页。

③ 参见参考文献 [8]。

④ 亦有郎世宁本人所绘一说。本文从德拉图耳著《中国建筑论》（L.F. Delatour: *Essai sur L'architecture des Chinois*），中译文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三、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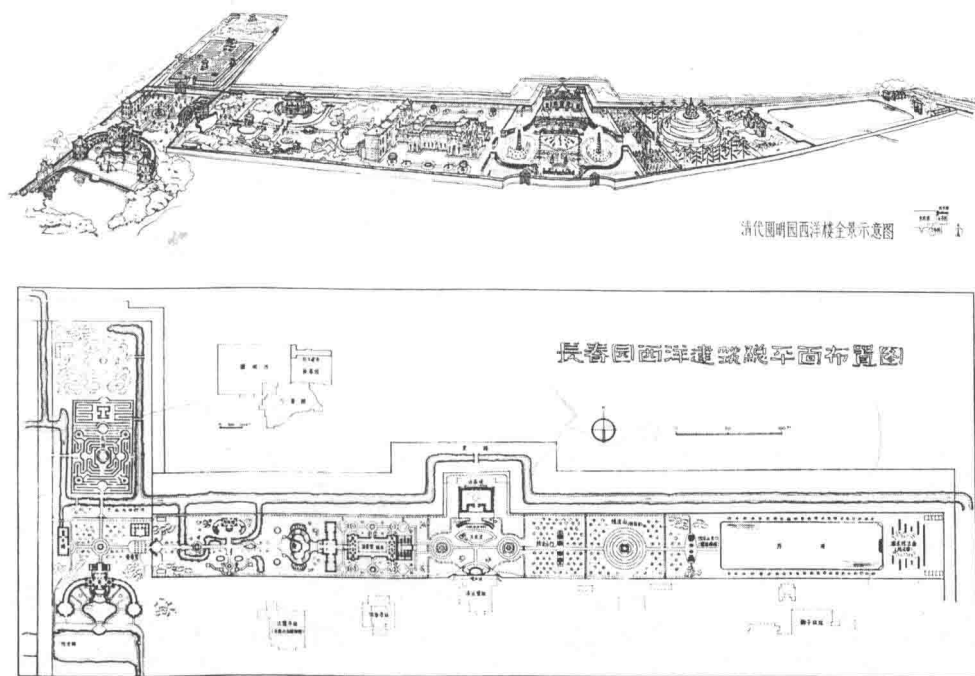


图2 西洋楼全景示意图(上)、总平面图
(金毓丰绘, 1980年; 选自参考文献[12], 8页、22-23夹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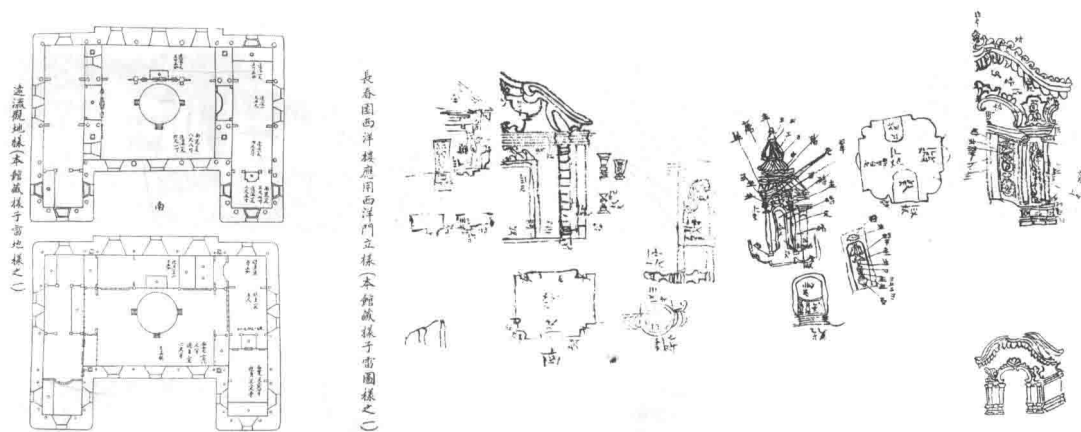


图3 远瀛观地样(左)、西洋楼应用西洋门立样
(样式雷图样,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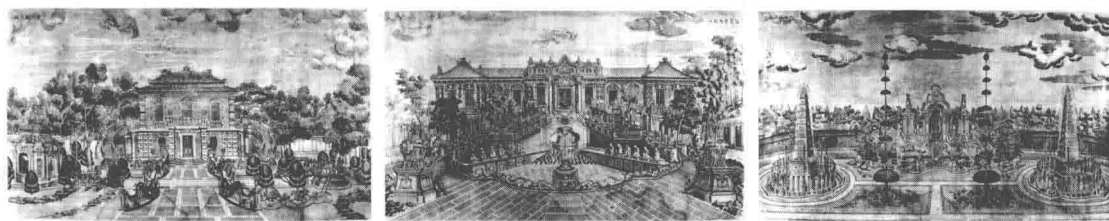


图4 西洋楼铜版图
(晁俊秀等绘, 1786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提供)
由左自右: 方外观正面(南面)、海晏堂正面(西面)、大水法正面(南面)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为英法联军劫掠焚毁，此后又陆续遭受破坏，现在已成一片废墟，仅西洋楼尚存部分残迹。

1870年前后，德国人奥尔末（Ernest Ohlmer, 1847—1927）摄有“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十四幅，这是圆明园劫后最早拍摄的一组照片（图5）。

根据历史资料及现有残迹分析，“西洋楼”建筑基本上属于意大利巴洛克（Baroque）建筑风格。由于它兴建期间正值“洛可可”风格在法国和欧洲流行，因此也深受其影响。同时，“西洋楼”中也有西方教士和中国工匠的创造（图6~图8）。



图5 大水法正面（1870年，奥尔末摄）
（选自参考文献[13]）



图6 大水法、远瀛观（1932年，喜仁龙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提供）



图7 1922年时的西洋楼遗迹（自左至右：远瀛观、方外观、养雀笼）
（选自参考文献[14]，240—2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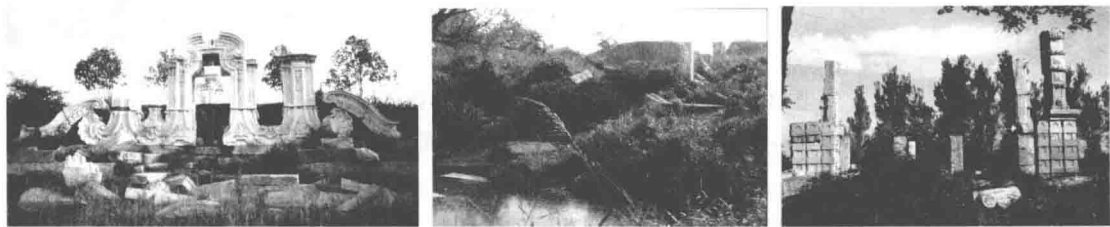


图8 1985年时的西洋楼遗迹
（自左至右：大水法、海晏堂、方外观）（1985年7月）

巴洛克式建筑在它于十七世纪作为新时期建筑的代表在罗马兴起时，突破了欧洲古典的、文艺复兴的常规，以新的、鲜明的特征开始了西方建筑史上的新时期。但是，巴洛克建筑从它在天主教的堡垒——罗马诞生的那天起，就代表着封建反动势力，同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的法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唯理主义的古典主义建筑相抗争。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洛可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潮流在巴黎兴起，反映了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所处的腐朽没落、不能自拔的境地以及庸俗的趣味。在建筑中，

“洛可可”风格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它排斥一切建筑母题，而代之以自然主义倾向的装饰题材^①。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把当时对欧洲建筑有很大影响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建筑形式带到中国，通过中国工匠之手，以“西洋楼”表现出来，以此炫耀西方文化，博取中国皇帝的欢心，这是自然的；处于“盛世”的乾隆欣赏充满异国情调、造型奇特新颖的“西洋楼”，把之作为玩物，也是不奇怪的。作为中国劳动人民十五年辛勤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西洋楼”是宝贵的；但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西洋楼”本身并没有自己的风格，它只不过是集西洋不同风格建筑的形式拼凑而成的杂烩，说它是东西方交流中“圆满灿烂”的“花朵”^②，似乎不能令人苟同。“西洋楼”于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现，虽有某种必然性，但处于当时代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建筑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主流之中，它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

“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③。

社会的落后，必然导致建筑的落后。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历时277年；而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迟了200年。西方社会步入现代史时期之日，中国的近代史时期才开始77年。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建筑潮流在十九世纪中叶起源，而中国的建筑历史尚在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的旧有形式。

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其开始于1840年的近代建筑的历史没有直接加入到世界“新建筑”潮流之中，而是走着一条畸形发展的曲折道路。

“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

十九世纪初，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王朝则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走上了日益衰败的道路。

“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年殖民地‘事业’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近代的历史”^④。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在社会的地位上，建筑只是匠人之术，建筑者只是个‘劳力’的仆役，其道其人都为士大夫所不齿”^⑤。

加之几千年来重大的工程建设基本上都控制在官家的手里，因此建筑只能在一定形制中发展，以“正统”的观念为理论上的依据。这同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体系是一致的。

“西洋楼”既然落入了帝王之家，受到了君主的青睐，自然也就具有了“正统”的身份。“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又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⑥。

① 有关“先浪漫主义”、巴洛克及“洛可可”的论述，参见：陈志华著《外国建筑史》有关章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年12月版；赫德森（G.F.Hudson）著《中国与欧洲》（*Europe and China*）一书第九章“洛可可风格”，载《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朱杰勤译，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版）；贺陈词：中国建筑及庭园艺术远播欧西的史实探讨及其对欧西的影响，载《大陆杂志》第四十卷第五期。

② 参见参考文献[1]。

③ 引自参考文献[9]，1页。

④ 引自参考文献[9]，31页。

⑤ 引自参考文献[10]，220页。

⑥ 引自参考文献[10]，221页。